



西行的足音

董乐山 著
许钧 编

BABIETA
WENCONG

巴别塔文丛
主编 许钧 唐瑾

湖北教育出版社

追寻译家足迹
展示译家视野
抒发译家情怀

许钧 编
董乐山 著

主编 许钧 唐瑾
巴别塔文丛

BABIETA WENCONG

西行的足音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 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行的足音 / 董乐山著, 许钧编.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巴别塔文丛 / 许钧, 唐瑾主编)

ISBN 7-5351-3223-5

I. 西… II. ①董… ②许…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184 号

出版 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 430015 传真: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 027-83669149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518019 ·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 3013 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6 插页 9.25 印张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5 千字

印数: 1-5 000

ISBN 7-5351-3223-5 / I·103

定价: 19.5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作者在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会上，1989年

【作者简介】

董乐山(1924—1999)浙江宁波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学系主任。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长期从事新闻、翻译、教学工作和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著译有《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等多种。

目 录

翻译:崇高的事业 ——代前言	1
-------------------	---

词语与文化 5

“主义”何其多	7
译名混乱何时休?	9
米兰达警告	11
垮掉一代与痞子文学	13
MAFIA 不是黑手党	15
学些中国近代史知识	19
新权威主义还是新威权主义?	20
商业汉语的自我次殖民地化	23
《时代》、《时报》和“时报广场”	28
民族、种族、族裔?	30
“盖世太保”与“克格勃”	35
诺曼底登陆日	39
迷思弗晰	41

18AD74

目 录

- 46 “人文主义”溯源
51 “隔都”还是“隔土”？
54 “修正主义”辨微
56 阿 Q 的革命
58 人名的借喻
61 再谈翻译甘苦
64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67 “克里斯马”说
70 穆斯林不能叫“穆族”

73 美国的面孔

- 75 今日美国新纳粹运动
82 战后婴儿一代
88 为清教徒正名
97 美国的传记文学
103 纽约的文化生活
110 残破的美国梦
——评美国通俗小说《廊桥遗梦》
118 再谈美国通俗小说
128 美国式的政治和法国式的隐私

专栏作家话盛衰	134
种族主义与文化相对论	143
从“白种人的负担”到“天定的命运”	147
自由主义：宽容还是偏执？	150
满纸辛酸泪	155
“黄色新闻”的由来	159

旧事重提 163

杜鲁门投掷原子弹的是非	165
历史悔罪年？	169
屠杀从自己人那里开始	172
“巴黎烧了吗”？	175
文明的终结	180
开创全球性的新文明	184
剑桥五君子与克格勃	188
冷战旧“话”重提	192
记伊罗生	195
一个时代的记录	205
——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代中国通	
法国大革命功过新论	210
《兹拉他日记》	213

目 录

——历史的重演？

- 217 记姚师莘农
- 220 衰老成之凋零
- 228 白文和我
- 237 我在上海孤岛时期的文艺活动

241 书斋随想

- 243 戏拟名著退稿信
- 245 东方和西方，相会终有期
- 250 谈禁书
- 252 是预言，还是现实？
- 257 孙悟空在西方的转世
- 262 《上海生死劫》其人其笔
- 265 拂去历史的尘埃
- 267 尽信书不如无书
- 273 布莱希特的“剽”与“窃”
- 276 读巴金萧珊《家书》有感
- 280 听风楼里的辛勤耕耘者
- 287 梅兰芳的翻译家儿子
- 291 编后记

翻译：崇高的事业

——代前言

在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九百周年的大会上，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符号学家恩贝托·埃柯作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为欧洲大陆明确提出了在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在他看来，“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能生活得更好，就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相互理解的氛围之中。”（见《跨文化对话》第4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页。）然而，“在承认差别的情况下，人类如何沟通呢？”（同上，见《卷首语》。）对于这一个有关跨文化交流的根本问题，也许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是，翻译家的回答恐怕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因为自从操着不同语言的人类有了相互交流的需要，为克服语言的障碍而寻求人类心灵沟通的努力就已经凭借翻译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人类凭借翻译而致力于沟通的努力是伟大而崇高的。打开《圣经》，在《创世记》中可以读到有关巴别通天塔的记载：人类向往“大同”，他们要筑一座通天高塔，扬名天下。这触怒了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让人类流离四方，言语不通。然而，人类没有屈服于上帝的惩罚，他们以英雄般的事业——翻译，向上帝发出了挑战；凭借



翻译,他们使上帝变乱的语言得以变成一笔笔带有民族特质的财富,在保存各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的桎梏,沟通着人类的精神。法国哲学家雅克·德利达曾经以《巴别塔》为题,对“翻译”这份伟业进行过深刻的哲学思考和令人近乎绝望的解构,在他看来,当上帝驱散人类,变乱其语言时,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不解的悖论:“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就我们的理解,这一悖论既昭示了翻译的必要性,同时也意味着翻译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恰如季羨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有关翻译可能性的形而上的种种论点,非但动摇不了翻译在实践上的必要性,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翻译活动的新视角;面对不同的语言,翻译家们是如何克服语言的隔阂,使看似不可能的翻译活动一步步在实践上成为可能,并有效地推动着人类不可缺少的跨文化交流?在外国文化、文学作品的译介、引进与接受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视界、选择与思考对翻译活动到底有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有过怎样的思考?这一个个问号打开了我们的思路。若能对国内富有经验、译绩卓著的翻译家对翻译、文学、文化的

思考文字进行某种总结，编成一套文丛，那无疑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翻译家的高尚情怀和神圣追求；有助于我们追踪他们在种种“异”的考验中，不懈地致力于不同文化交流的生命历程；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展示的宽阔的文化视野中，更深刻地领悟到翻译的真谛所在。于是，便有了这套精心组编的十二集文丛。

这套十二集的文丛，事实上是十二位翻译家所走翻译道路的一个缩影。十二位翻译家，有内地的，有香港的。语言涉及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语种，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异”与“同”之间跋涉。在但丁的故土，在莎士比亚的家乡，在歌德纪念馆的门前，在夏多布里昂的墓旁，在福克纳走过的小径上，在博尔赫斯工作过的图书馆里，在紫式部的宅邸……留下了他们不懈地求真求美的足迹。他们谈翻译、谈人生的文字，他们对文学、对文化的思考，他们对生命、对精神的理解，为我们打开了思想的疆界，带来了永远的希望和梦想。当我们要为这套文丛起名时，“巴别塔”三个字不约而同地映现在我们的脑海：“巴别塔”，通天之塔，它既是人类向往“大同”的历史记录，又象征着人类追求心灵沟通的美好愿望，更是翻译家们默默耕耘、不懈求索的见证。让我们记住巴别塔，记住建设巴别塔的众译家！

许 钧 唐 瑾

2001年10月28日

词语与文化

BABTETA

W&NCONG

BABIETAWENCONG



“主义”何其多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 20 世纪 40 年代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政治与英国语言》。文中列举许多报刊文章（其中不乏如政论家拉斯基那样的名家的大作）为例，说明英国语言受到政治的败坏（当时还没有流行“污染”一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隐晦含混的辞汇和短语，失去了原来的简洁和明快的特点。

这篇文章如今读来仍有现实意义，因为一是语言受政治污染于今为烈；二是不独英语如此，这个毛病在现代汉语中也非常突出。所以造成这个恶果，根本原因当然是政治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但就现代汉语来说，还有一个罪魁祸首，那就是翻译，因此这种政治污染也可叫做翻译污染。

“主义”的泛滥，就是翻译污染一例。

考现代汉语中“主义”一词，作为名词组合成分，原是从英语后缀“-ism”译过来的。用在一种学说、理论或主张方面，“主义”音、义兼顾，确是十分恰当的妙译，比如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民族主义等等。

然而在英语中，“-ism”作为后缀，除了学说或理论以外，视其前面与之组合的词，还有其他不同含义，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译为“主义”，就不尽恰当了。比如：

它作“行为”解时，作“恐怖”一词的后缀。就是“恐怖行

为”，而不是“恐怖主义”。否则，英语中“受洗”这个行为，也以“-ism”结尾，若也译为“主义”，那么“受洗”就要译成“洗礼主义”了。

它作“状态”解时，可缀在“贫困”后面，即成“贫困状态”，而不是“贫困主义”。

它作“精神”或“气质”解时，现代汉语中流行的直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就远远不及原来已有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或“爱国心”那么传神。

它还可当“恶习”解，与“酒精”结合，应是“酗酒”，岂能译为“酒精主义”？

近年来，随着改革和开放，西风第二次东渐，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在随之而来的新名词中间，“主义”更是层出不穷，但其中也有不该是主义的“主义”的，比如“新闻主义”就是“主义”泛滥的一例。

考英语“新闻主义”一词，本不是主义，在汉语中早有定译，或为“新闻学”，或为“新闻工作”，或为“新闻写作方法”，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今不知是译者无知，还是故弄玄虚，竟把它照字面直译为“新闻主义”，仿佛是一门新创学说。若依此类推，“新闻系”应改名为“新闻主义系”，“新闻工作者”或“新闻记者”应称为“新闻主义者”了。

译名混乱何时休？

外国人名、地名的汉译，历来存在着混乱现象。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有关方面曾责成新华社和地图出版社联合提出一个译名统一方案，后来并按此方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系列译名手册。这对于译名统一工作起了不少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译名混乱现象又重新抬头，甚至越演越烈了。

一个原因是当初按译名统一方案编制的译名手册，本身存在着错误，使得使用者难以苟同，只好自译，以致出现了混乱。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的两个州名 Michigan 和 Illinois，按正确发音应译为“密歇（或西）根”和“伊利诺埃”，但地名手册却译为“密执安”和“伊利诺斯”。最近版本的地名手册虽已作了更改，但为时已晚，这种错译已流传到国外，有些外国电台华语广播也将错就错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原译名统一方案把原名中所有音节不分轻重都一一照译，结果用汉语发音读起来十分别扭。最近一个例子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一口气读下来很容易出错，如果“吃掉”后面几个音节，译为“马斯特条约”不是就好多了吗？可以有“北约”、“华约”，不妨也可以有“马约”，不过这是简称，又当别论。但是 Roosevelt 不是译为“罗斯福”，而没有译为“罗斯佛尔特”吗？耶稣基督也没有译为“杰塞斯·克赖斯特”。（刚